

逯钦立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前后

刘孝严

逯钦立先生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原定名《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已于1983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并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先生辑校此集可谓殚尽毕生心血,自辑校之始至出版之时,前后四十余年,而先生已于十年之前告离人世,竟不得亲见自己心血结晶的问世,实为莫大的遗憾。

我在1964年至1967年间为逯钦立先生的研究生,今受逯先生夫人罗筱蕙之托谨将先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前后的有关情况加以简要介绍,并借此机会向对于此集的出版予以关心、帮助的各单位和有关的先生、学者、同志表示深挚的谢意。

1939年,北大校长蒋梦麟倡议成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以傅斯年为所长,郑天挺为副所长,并决定招收十名研究生。先生于中文本科毕业后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为十名研究生之一,导师为罗庸(字膺中)和杨振声(字今甫)二先生。研究的专题为“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的整理、校勘及同期的文学史研究。从此,先生全部精力即倾注于此,直至停止呼吸。

“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的整理和校勘,前人曾有相当的基础。唐代的《文馆词林》、宋代的《文苑英华》和宋人类纂的《乐府诗集》等书都对中国古代诗歌作了一些辑佚和整理的工作。明代的冯惟讷更搜集汉至隋十一朝的诗歌谣谚,编定《古诗纪》,成156卷,可以说为古诗的整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近人丁福保在《古诗纪》基础上编成《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54卷,对《古诗纪》所收汉以后诗又作了辨伪订讹的工作,编选和考辨都较精到。但前人的辑校工作仍有不足,冯惟讷所编《古诗纪》“大多因袭刘履的《广文选》,张之象的《古诗类苑》,包节的《苑诗类选》等书,拘执于旧习,有严重的缺点谬误,第一,搜辑不够广泛,遗漏了不少篇章。

距离完备程度还相当远。第二,没有认真地下考订整理的工夫。许多伪诗和非诗的作品都收进去,许多诗人许多作品搞错了时代……第三,给后人留下了难题,添加了混乱。”^①丁福保编订的《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未收先秦诗歌。失之不全不备;辑诗不标出处,不便复核,“其缺点谬误不亚于《古诗纪》,容易使读者导致错误。”^②对于进行深入的研究不足为据。先生深知前人辑校之难,更知自己任务之巨。先生辑校“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是“继承了《古诗纪》而又在《古诗纪》编纂基础上进行辑补、校订与整理的。”^③这种补其遗漏、正其谬误的工作要求把“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的辑校水平提高一步,因此是更加困难,更需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先生对《古诗纪》所辑之诗逐一进行校订,对《古诗纪》编订的弊病认真进行分析研究,撰写了《〈古诗纪〉补》^④一文。把1939年至1941年间研究《古诗纪》的心得加以集中,并取鉴于前人,加以独思深研,订出辑校古诗的原则36条,为辑校“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铺平了道路。

194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逯钦立先生也随所到李庄,翌年于北大文科研究所毕业,并留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44年经所内同事介绍与当地罗筱蕙女士结婚。罗女士对先生体贴照顾无微不至,夫妇和谐,患难不移,使先生无家室之累,余时罗女士尚能助先生查阅书刊,誊抄文稿和卡片,先生实得一得力内助。

先生孜孜不倦地从事“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的辑校工作,至1947年便完成了初稿,写出了校记和辑录。随着辑校工作的进行,先生对汉魏六朝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了大量的“辨伪”和“考源”的工作,对于重点的作家作品也作了深入

收稿日期:2008-12

作者简介:刘孝严(1942—),吉林洮南人。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逯钦立《〈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后记》,文见《吉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3期。

②逯钦立《〈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后记》。

③逯钦立《〈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后记》。

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1948年。

的探讨。先生特别对陶渊明的诗歌和陶渊明的品格产生了兴趣。陶渊明注重品格修养,安于贫贱而不阿权贵,富于才华而不逐名利的品质,深深感染了先生。1943年,先生发表了《陶渊明行年简考》^①;1944年,先生又作《陶潜里居史料评述》^②,对陶渊明的生平做了初步的探讨,从此以后,先生一直没有中断对于陶渊明和陶诗的研究。

先生“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辑校初稿于1947年完成之后,未待修改,国内政治形势便发生了重大变化。1948年秋,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先生热爱祖国,不满国民党反动统治,便毅然决定脱离历史语言研究所,辗转广西任教。这期间先生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将辑校诗集时的研究心得公之于世。《古诗纪补正叙例》、《汉诗别录》虽分别脱稿于1941年和1942年,也于此时发表。关于陶渊明研究的论文有三篇:《形影神诗及东晋佛道思想》、《述酒诗题注释疑》、《陶渊明年谱稿》,这三篇论文不仅说明先生对陶诗的研究有了深入,而且也可以说明国内学术界对陶渊明的研究有了发展。

先生在桂林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广西解放后,先生曾参加该校的接管工作,并任原广西大学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后又参加省、市文联的工作。1951年,先生曾被选为桂林市人民代表。

1951年秋,先生应东北师范大学之聘,携眷北上到长春,任中文系教授。途经北京时曾与故友欢会。长春为北方城市,天气温差变化较大,冬季尤为寒冷,但先生来校心情畅快,不以天寒为意,壮志雄心,欲为社会主义祖国尽一己微薄之力,诚心靠近党的组织,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对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尤为勤力,赢得了师生和领导的好评。

在从事教学工作之余,先生始终没有终止“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辑校稿的修订工作,1958年,大功便基本告成。并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联系出版事宜。1959年9月4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复函索要“该书凡例及样稿”;同年9月22日,中华书局总公司北京编辑部来函,询问先生是否有《古诗纪补正》一稿,希望先生能另行修订《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并表示“修订时如有什么困难,请见告,当和您校党的负责同志洽商,务使尽量解决,以完成此工作。”给予极大重视、支持。同年10月14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邮来代表人为

陈向平的《约稿合同》(上编字第100号)。先生遂与上海编辑所签定了这个《约稿合同》。

1960年10月20日,北京中华书局文学组来函通知先生《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我们已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洽妥,全书由我们出版,”并同意先生将此书“印成一部”的意见。至此,先生辑校之作改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先生曾有《屈原离骚简论》一作,1957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先生曾作修改,对此中华书局也于1960年11月19日来函索稿,希望先生《离骚简论》和《离骚译注》“寄下一读”。

1958年至1965年间,先生与中华书局多次通函磋商“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的体制问题,最后终于确定以作家卒年先后编次各家作品,以便显示同期作家作品的不同风格和彼此联系,便于观察不同时期诗歌的风格和流派的递承和演变。为便于复核,辑校之诗和残句都注明出处,不同版本的异文均加以记录,对于作家时代,作品真伪尽其可能作出考订,从而为诗歌史的研究提供翔实、完备而可靠的资料。体例的确定,中华书局编辑部有关同志实有很大的贡献。

1964年2月15日,先生完成了《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的整理修订工作,并作《后记》,对历时二十余年的辑校工作作了总结。“后记”介绍了诗歌研究方面作品资料残缺和不足凭信的情况,对冯惟讷的《古诗纪》和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介绍了自己辑校工作的情况,尤其说明了辑校“一部较为完备和可信的诗歌资料书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先生感触颇深地说:“我国这样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应该有一部新编的古诗选。”先生的爱国之心,尽可于此一语得见之。“后记”在1964年《吉林师大(即今东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三期发表。1965年,先生将《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稿寄给中华书局送审。此时先生心情振奋,颇有争取作出更大贡献的决心。先生题于“结婚二十周年纪念”照像上的即兴“七律”诗充分表达了先生积极向上的精神:

一日夫妻百日恩,廿年辛苦倍情亲。
花红茶院同心结,雁断苍梧别梦频;
梁孟为怀坚素节,松萝至老有青春。
来兹岁月须珍重,想列光荣榜上人。

先生在1964年大体完成了《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的整理修订和体例编排之后,便开始了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先生共招收两名研究生,除我

①《小说月刊》,1、2期合刊,1944年。

②逯钦立《〈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后记》。

之外，还有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贺中复同志，专业是“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先生以极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一向认为这是党交给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从不把研究生仅看作自己个人的学生，而是看做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先生亲拟了详细的研究生培养计划，并且认真地征求学校和系领导同志的意见，然后加以修改，再与我们共同研究计划的落实问题。先生虽然对先秦魏晋南北朝文学有独到的深入的研究，但为我们二人讲课都在事前作认真的准备，还写有详细的讲稿。先生不以师尊为倨，讲课时常让我们提出不明白的问题，让我们谈不同的看法。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和看法，他总是与我们讨论，从不把他的看法强加给我们。由于先生历来为人诚实忠厚，平时严谨谦虚，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中，虽被列入反动学术权威之列，却没有受到皮肉之苦。先生在“大风大浪”之中经受到了各种“考验”，其间的坎坷难于述说，思想时有苦闷，身体日渐不佳。为了同疾病斗争。先生常常清晨出户，以步走的方式加强体质的锻炼。多年的积累，先生已有明显的驼背。但先生仍严格要求自己，下乡下厂，也都尽力参加。反复无穷的斗、批、改，使先生的思想逐渐增多了困惑和不解，甚至后悔自己从事文学的研究，怀疑自己的专业到底有多大的价值。这也影响了他对陶渊明的研究。1973年先生完成的《陶渊明集校注》就反映了先生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陶渊明集校注》几易其稿，先生力求以科学见解对陶渊明作出评价，然而身在劫难之中，是非难明，先生对陶渊明的评价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1973年7月15日，先生寄出《陶渊明集校注》稿给中华书局，这是先生对陶渊明研究的最后结晶之作。此书直到1979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先生未能得见其面。

1973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劫难中不同寻常的一年，由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的败露，邓小平同志开始主持中央的工作，各方面都有了转机。这时先生惦记心间的《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的出版也有了新的信息。8月5日，先生收到中华书局寄回的书稿，知中华书局决定出版此书，要求作最后的编订修改。先生抚摸积有盈尺的书稿，感慨万千，二十余年之心血，历新旧中国之变迁，经文化革命之波折，十年而后终有了面世的机会，焉能不为之兴奋之感。先生感触颇深地对夫人说：“还是有人懂得这个东西的，这次可以出版，我以后就要忙了。”先生决定集中精神从事改稿的工作，同时对于政治的进步也更加热心。

8月6日，午睡之后，先生起床时便有胸闷感觉，但仍坚持到系内参加批林学习。谁知行于路上不适之感突然加剧，额角浸出汗珠。先生仍坚持向系内走去，不想到系门口便呕吐昏倒，汗如雨下。当时系内教师多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只有一些老弱病残者在系内。待汽车拉先生去市内医院，途中先生便停止了呼吸。我得知先生病故的噩耗赶到医院，见先生尸体已僵，悲痛万分。夫人无法相信先生会真的死去，只是抚摸着先生的遗体，不断地说着：“他没有死，让他休息一会！”

时在工军宣传队占领学校之际，先生虽为有名教授，但被列在资产阶级权威之列，自然其死也不足为道。除在校门口贴了一纸讣告之外，地方报纸连一字消息也未刊发。学校统战部主持举行了先生的追悼会，对先生的一生作了积极的评价。对先生遗属给予不多一点补助，事后还受到造反派的攻击。

先生入殓全身着白丝衣，这是依照先生生前的囑愿。先生曾参加某教授追悼会。归家后与夫人议及丧事，笑谈自己死后不穿棉衣棉裤，而穿白衣白裤。自己干干净净来到世上，也要干干净净地离去。不想到往日的笑谈竟成为应验的谶语。先生最后留于人间的手迹是一张写给夫人的便条：略云：“藕曼：厨房堆满砖石，要留心避免摔倒，有些事可教弘秀（先生幼女，引者注）去做（如燕窝窝头）”。先生与夫人的伉俪情深益于言表，而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处境于中也不难窥见。

先生辑校《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最终以《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书名出版，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人民日报》1983年1月10日在题为《中华书局将出版一批重要古籍》的报道中说：“古典文学方面，有逯钦立辑校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这部分是迄今最完备的先秦至隋的诗歌总集。”《光明日报》1983年10月18日在题为《中华书局出版文学总集的情况》的报道中说：“一九五九年已出版有近人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可惜收诗不够齐备，体例也欠谨严。今年将出版今人逯钦立重辑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一书，不仅补入先秦歌谣逸诗，而且每诗必注出处异文，颇足据信。”《瞭望》杂志1983年10月号发表许逸民的短评，题为《古诗总集的新收获——写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出版之前》。该文介绍了先生辑校之集五个优点：1、“取材广博。本书借助杨守敬的《古诗存目》作为索引，遍检唐宋以前载籍，求多务得，引书近三百种，超出《古诗纪》半数”。2、“资料信实。不论全诗或残句，都注明出处，便于

征引复核，大大提高了科学价值。”3、“异文详备。凡所引各书的不同文字，或一书而不同版本的文字以及前人的校勘成果，均予记录。这些异文对于分析主题思想、艺术特色，都具有参考价值。”4、“考订精审。这是作者下力最多，也最能反映作者水准的一个方面。诸多辨证真伪、确定时代、订正题目、分合篇目、剖析体裁等，有不少真知灼见。”5、“编次得宜。本书严格按照作家卒年的先后编次，如无卒年而有社会关系可考者酌入各卷。这样的编排脉络清晰，能显示出同期作家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也易于比鉴不同时代的诗风和流派，为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许逸民先生认为，先生“这本诗歌总集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它代表着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工作达到的新高度，也是对已经故去的逯钦立先生的最好纪念”。

先生生前对于辑校“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的意义曾有系统的论述。先生认为：“我们要发展今天的新诗歌，要了解我国诗歌的昨天和前天，就必须清理这一时期诗歌文学的发展过程，批判地继承古代诗歌的民主性精华。清理发展过程，吸收民主性精华，需要充分的作品资料，即完备的和可信的作品资料。然而旧社会的学者还没有来得及替我们预备下这方面的东西，本书如果能够满足上述要求，自然就具有重要意义了。退一步讲，本书至少提供了下列一些方面：第一，经过搜辑、整理、编纂，我们首先了解到古诗歌资料比较着还是相当丰富的……第二，经过搜辑、整理、编纂，我们又了解到对古诗歌资料也要明确其残缺情况……第三，经过搜辑、整理、编纂，我们掌握了一个衡量诗篇完阙的尺度：凡是辑自类书的，一般都是不完整的；凡是来自旧集的，一般都是完整的。本书标明出处的意义，自然在于明确某诗的最早见于某书，而尤其在于借此明确某诗为完为阙。有了这样一个尺度，我们在选读古诗方面，在评价旧集方面，就多了一个依据，有了另一个鉴别标准。那么，我们的工作就能作得更好，更加科学”。

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的意义堪与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和《唐宋传奇集》相比。鲁迅先生从大量的类书和古籍注疏中辑校出自周至隋已散佚的古小说三十六种，成《古小说钩沉》，为迄今我国唐代以前古小说的最为完备的专辑。郑振铎高度评价鲁迅的《古小说钩沉》，认为该书是“用最谨严的‘汉学家法’来校辑的，较之《王函山房辑佚书》和《吴氏逸书考》的草草

成书，大有天渊之别”。^①鲁迅的《唐宋传奇集》，根据《太平广记》、《文苑英华》、《资治通鉴考异》、《百川学海》、《青琐高议》等类书互相比对，甄选辑录了唐宋传奇四十五篇，并作《稗边小缀》，考订作者和故事源流，一扫明清间唐宋传奇版本混乱，文字错落，作者作品张冠李戴等尘埃迷雾，使当时学者有“拨云雾而见青天之感”。先生尽毕生精力，以严谨汉学家法，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乃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考订精严的先秦至隋朝的诗歌总集。它对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必将起到巨大的影响。国内外有志于中国古代诗歌研究的学者必将认识到先生辑校此集的巨大意义。

《文学评论》1984年4期发表著名文学史家曹道衡先生的专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评价》，对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了全面、客观而又高度的评价，以一个文学史专家的眼光肯定“逯先生此书的出版对汉魏六朝诗的研究来说是一件大事。”“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这样材料宏富，体大思精之作，对广大研究者来说实在是大有裨益的。此书一出，对唐以前诗歌的研究显然会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先生离世之后，许多生先的生前好友都非常关心先生遗作的出版之事。阎文儒先生、任继愈先生、张政烺先生、刘禹昌先生等都以极诚恳的心情过问先生遗著的出版工作。阎文儒先生为逯先生写了略传；郑天挺先生为逯先生《汉魏六朝文学论集》作序；吴云同志为逯先生辑成《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11月）；中华书局编辑部并将逯先生的遗文《“相和歌”曲调考》列于《文史》第十四辑发表。

先生之遗作得以面世，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经各有关单位和诸多先生、同志共同关心和帮助的结果，先生九泉之下如果有知会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最深切的谢意的。

先生心血的结晶之作已显示了光彩，先生昔日的愿望已得以实现，先生可以瞑目矣。

（说明：本文作于1984年3月24日，本次发表仅作个别文字的修订。）

（责任编辑：刘兵）

^①郑振铎《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人民文学》创刊号。